

調和

——徐寶謙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

Reconciliation: XU Baoqia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趙 婷、李曉晨
ZHAO Ting LI Xiaochen

作者簡介

趙婷，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李曉晨，青島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O Ti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Email: 17854299661@163.com

LI Xiaochen,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xiaochenli88@163.com

Abstract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to the survival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ut also affects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Research into the life of Xu Baoqian shows him to be a devout Christian with a deep 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dica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Xu affirme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but was also convinced that there was no irreconcilabl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and proposed practical ways promote the adaptation of Christianity to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some of Xu Baoqian's views are somewhat subjective, hi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his reconcili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are valuable reference tools for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s.

Keywords: XU Baoqian, Christianity, Chinese Culture, Reconciliation

徐寶謙（1892-1944）是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同時也是基督教界傑出的平信徒領袖之一。平生篤信基督，樂意效法耶穌基督犧牲的精神，奉獻出自己的身、心、靈，為國家、社會與同胞服務，^①是基督教界的代表人物。

“調和”是徐寶謙對處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基本立場。徐寶謙“對中國文化有相當了解”，同時又對“基督教有相當信仰”^②，這是其嘗試調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思想理論基礎。徐寶謙認識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雖然存有衝突，但二者具有調和之可能性和必要性，認為這“對於中西文化，各有深刻的影響”^③。因此，徐寶謙在對基督教與儒家關係分析考量的基礎上指出“孔耶兩教可以並行不悖”，並且認為“設兩者能互相調和，則溝通中西文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④。

20世紀上半葉，非基督教運動的興起倒逼基督教內部作出深刻反思，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本色化運動。基督徒知識分子積極尋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平衡點，提出了一些調和二者張力的觀點，徐寶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以徐寶謙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為考察對象，分析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論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是徐寶謙論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重要文獻，集中體現了徐寶謙對二者關係的主要觀點和態度，是本色化運動中調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重要著述。但是目前學界對徐寶謙相關研究不管是

^①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宗教徒與國家公民身份的糾葛——華北淪陷區天主教徒抗戰救亡活動研究》（項目號：18BZJ033）階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Religionists and National Citizenship: Study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National Salvation Activities of Catholics in the Occupied Areas of North China" (Project No.: 18BZJ033).]

^②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3年，第228頁。[ZHA Shijie, *Biography of Chinese Christian Characters* (Taipei: China Gospel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3), 228.]

^③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年，第3頁。[XU Baoqia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34), 3.]

^④ 同上，第5頁。

^⑤ 同上。

數量上還是深度上都很不夠，一些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其唯愛思想和鄉村服務實踐方面，^①而對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思想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對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論述的分析，為基督教中國化提供一定思路。本文首先闡釋了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衝突之客觀存在的論述，其次闡明了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調和之可能性的分析，再次闡述了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調和路徑的論說，最後對徐寶謙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分析做了總體的評析。

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存異之客觀性

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總和，文化的實踐性和繼承性特徵決定了文化差異之客觀性。徐寶謙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基督徒，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都具有深刻理解，從神本主義與人本主義之別、溯源與截流之別以及內修與外治之別，對二者之差異性做了具體詮釋。

（一）基本精神之衝突：神本主義與人本主義

所謂神本主義，指的是以神的意志，亦即某種“天理”或“教條”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的一種思想。^② 所謂人本主義，美國《哲

^① 參見YEUNG Kwok-keung, "Taking Up Wordly Causes with a World-Rejecting Spirit: The Religio-Political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Xu Baoqian (1892-1944)," PhD.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劉家峰：《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義的命運——以徐寶謙與賀川豐彥為個案的比較研究》；藍希峰：《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服務研究：以江西基督教農村服務聯合會黎川實驗區為個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1年。[LAN Xifeng, *A Case Study of Christian Social Servi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x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 Lichuan Service Centre*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15); WU Lim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Hong Kong: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② 席雲舒：《從物本主義、神本主義到人本主義——“中國精神現象學”的視角與當代社會轉型》，《文藝爭鳴》，2000年第3期，第51頁。[XI Yunshu, "From Materialism, Deityism to Humanis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ntal 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Transformati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no.2 (2000): 51.]

學百科全書》將之定義為“任何承認人的價值或尊嚴，以人作為外物的尺度，或以某種方式把人性及其範圍、利益作為課題的哲學”^①。徐寶謙認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不同的，是相衝突的。因為基督教是神本的，中國文化是人本的”^②。神本的基督教認為神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人必須依靠“上面”的力量，即神力，才能得救。而人本的中國文化不信仰神力，認為人可以通過自力而得救。^③因此，根本精神之差異致使二者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徐寶謙從宇宙觀和人生觀兩個方面論證基督教神本主義的本質屬性。基督教發源於猶太教，而猶太教的創造者希伯來人是具有豐富上帝觀的民族，這是基督教上帝創世說的思想淵源。基督教的創世思想啟示了基督教的神本精神，包括神本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基督教教義中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借着他造的”。（約1:1-3）說明在基督教文化中，萬物都是神造的，宇宙萬物的產生和消亡都由神支配。據此，在宇宙觀方面，徐寶謙指出：“唯其神本，所以基督教在宇宙觀方面，信仰神是宇宙人生的創造者管理者，神是宇宙人生的起源及終局。”^④在人生觀方面，徐寶謙認為：“基督教以人為陷在罪惡之中，無力自拔，故必待上帝的救恩，而後才能恢復‘兒子的名分’。”^⑤人類因背叛上帝而具有原罪，所以人是不能自救的罪人，因此基督耶穌作為上帝的獨子“道成肉身”，降生於人間拯救人類。

人本主義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內容。中國文化的人本主

^① 沈恆炎、燕宏遠：“附：西方主要國家百科全書中的有關條目，”載《國外學者論人和人道主義》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758頁。[SHEN Hengyan, YAN Hongyuan, “Appendices: Relevant Entries in the Encyclopedias of Major Western Countries,” *Foreign Scholars on Humanity and Humanitarianism*, Vol.1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1991), 758.]

^②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6頁。

^③ 同上，第41頁。

^④ 同上，第7頁。

^⑤ 同上，第6頁。

義核心思想體現在：人為萬物之靈，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人本文化，顧名思義“以人為本”，把人置於世界的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作為萬物的主宰。^①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主張“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因此徐寶謙認為，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昊天主宰之說……漸趨衝淡”^②。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上帝創造之說，除稗官野史之外，絕不見於經書”^③。在人生觀方面，徐寶謙指出“依靠神力才能得救之說，可謂絕非我國智識階級所樂聞”^④，儒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思想流派，“人性本善，即惡亦可靠人的自力，漸漸改善”^⑤是它們的共同主張。這就說明中國人本主義精神崇尚人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注重人的自力得救，而非依靠虛幻的神力，塑造人們勤奮和勇敢的品質。

（二）溯源與截流之別

徐寶謙指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溯源與截流之別，“耶教是溯源的，孔教是截流的”^⑥。基督教是溯源的，“唯其溯源，所以一切以上帝為出發點，亦以上帝為歸宿”^⑦。基督教對人神關係的探討，解決了人的形上追求和終極關切。基督教教義中對生與死的問題作了回答，因信而神與人同在，得永生；因悖逆獲罪與神隔絕而死亡，然而上帝的博愛使人類得救贖。因此，基督教不僅“專主生前，而且及死後”^⑧，生、死與復活，前世、今生和來世都得到了詮釋。

^① 參見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0頁。[ZHANG Dainian, *A Survey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290.]

^②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6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7頁。

^⑤ 同上，第6頁。

^⑥ 同上，第4頁。

^⑦ 同上。

^⑧ 轉引自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1860-1911）》，香港：宣道出版社，1995年，第130頁。[YING Fuk-tsang, *Cultural Acculturation and Chinese Christians (1860-1911)* (Hong Kong: China Alliance Press, 1995), 130.]

徐寶謙認為儒家思想是截流的，“唯其截流，所以不談性與天道，不求了解死後鬼神”^①。孔子提出“未知生，焉知死”“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體現了儒家對現世的重視而輕虛妄的來世。儒家思想高揚“積極入世”的實踐精神，堅持“學而優則仕”，鼓勵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統治者貢獻治國之道，因此有人稱儒家思想是“知生前而治世之大，不知死後審判之至理”^②。

（三）內修與外治之別

徐寶謙認為基督教與儒家文化的側重點有內修和外治之不同，相較耶穌注重“內心的改革，個人生活的改造”，孔子的根本注重點則在“移風易俗，制禮作樂”^③。

基督耶穌“道成肉身”降生到人間，是為拯救世人，最終被釘死於十字架，完成了對世人的救贖。因此，基督耶穌是真善美的化身，彰顯其博愛、犧牲和奉獻等崇高精神與偉大人格。基督教宣揚“博愛”，愛所有人，愛人如己，甚至於愛自己的仇敵；提倡服務和奉獻精神，“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施比受更有福”。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不僅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同時也成為基督徒的道德標準。基督教注重人的精神和品格的提升，一個人可以因效法基督而成為新人，擁有美好的人格和新的生命。

如果說基督教關注修身，那麼儒家思想文化則更注重治世。儒家思想中同樣也有對個人修養的要求，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作為做人的根本。然而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④的古代宗法制社會傳統中，這種對個人內在修養的

^①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頁。

^② 轉引自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1860-1911）》，第130頁。

^③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頁。

^④ 周振甫譯註：《詩經》，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35頁。[ZHOU Zhenfu, trans., *The Book of Poetry*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2), 335.]

要求有維護社會秩序、服務政治統治之成分。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的維護，要求形成森嚴的等級制度，而禮樂制度則為宗教分封制提供了一套完整、嚴格的禮儀等級制度，為政治秩序的穩定提供了遵循。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由儒家得以繼承、弘揚和發展，發揮着維護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治世功能。儒家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①，把禮樂文明作為一種行為規範，維護着社會秩序；“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②，堅持通過守禮達到和諧狀態。

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調和之可能性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徵，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基督教作為世界宗教，其起源和發展的歷程（對兩希文化以及古典羅馬文化的繼承）凸顯了強大的適應性，這就使二者的調和具有可行性。兩種文化形態在相遇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交流和碰撞，但在交流對話中又會實現不同程度的融合。因此，徐寶謙認為基督教基本精神之於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補充、基督徒的改革精神以及譯著事業的發展，增加了二者調和之可能。

（一）神本主義對人本主義精神需求的補足

徐寶謙認為“基督教的神本信仰確能補充人本主義的不足”^③。“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④的積極樂觀的人本主義，“固然能夠策勵人使之腳踏實地，不尚玄虛”，但是“人類對於死後的推測及興趣，未必因着聖人的一句話，就會完全失去”^⑤。因此，他認

^① 張鈞要譯註：《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71頁。[ZHANG Yanying, trans., *The Analects*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7), 171.]

^② 同上，第8頁。

^③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9頁。

^④ 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第290頁。

^⑤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4頁。

為基督教神本主義信仰可以補足人們精神慰藉的需要。

人本主義堅持以人為中心和尺度，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這種思想，一方面使中國文化擺脫了有神論的觀念，避免了因神學獨斷而引發的思想信仰領域的動蕩。另一方面，人本主義強調社會發展進程依賴於人的實踐探索，通過主觀修養提高人的社會實踐能力，凸顯了文化中蘊含的理性和實用性特徵。然而，人本主義關注的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缺乏彼岸世界的標準和追求，這種“內在超越”不可避免地受所處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因此“往往擺脫不了對政治的依附或為權力所御用”^①，容易形成極端利己主義和狹隘功利主義。

基督教的神本主義信仰中，堅持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以自我犧牲來實現對世人的救贖。徐寶謙認為，基督救世並沒有甚麼奇妙的方法，有的只是“上帝對世人所顯犧牲的愛”^②。這種博愛和犧牲的精神，以及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可以滌濯人本主義文化中出現的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等精神雜質，幫助人們進行深層的審視和反思，“回心轉意，痛自懺悔，拋棄自私自利的人生觀”，^③從而樹立時代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另外，“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與昇華，以達到與絕對本體的合一”，^④這個思想價值體系可以彌補人本主義“內在超越”對現實世界的依附。基督教乃是以一種“形而上”的精神來指導其“形而下”的實踐，從而體現出其“神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移及其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和有機共構。^⑤

^① 卓新平：《基督教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12頁。[ZHUO Xinping,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0), 212.]

^②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9頁。

^③ 同上，第50頁。

^④ 卓新平：《世界宗教與宗教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1頁。[ZHUO Xinping, *World Religions and Religious Studi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1992), 31.]

^⑤ 卓新平：《基督教論》，第219頁。

(二) 基督徒的改革精神提高了適應性

徐寶謙認為基督徒的改革精神增加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調和的可行性。自19世紀下半葉中國基督徒就開始了基督教的改造，從自立運動、合一運動到本色化運動，彰顯了基督教在華傳播中國化的奮進歷程。毋庸置疑，基督徒的這種改革精神成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適應的重要驅動力。

近代以來，不平等條約中的保教條款成為基督教在華擴張的“通行證”，這就使基督教不僅帶有“洋味”，而且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因此，民族與文化衝突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教案”和大規模的非基督教運動，激發了中國基督徒的改革意識，積極探索基督教在中國民族、社會、文化相適應的發展之路。其一，自立運動是為了實現教會的自治、自傳、自養。殖民主義勢力侵略的加劇，喚起了基督教界愛國人士民族主義意識的覺醒，而基督教騎着帝國主義大炮在中國“闖蕩”，則使基督徒先進分子發起了擺脫西方教會控制，實現中國人自辦教會的自立運動。自立運動主要致力於經濟上的自養以及教內事務管理上的自治，由此邁出了基督教中國化道路上的第一步。^①其二，合一運動是在主流教會的倡議下力求擺脫宗派束縛的教會協作運動。^②基督教會合一運動開端於19世紀下半葉，並於20世紀上半期受國際普世合一運動的影響而進一步拓展。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會的建立，是基督教聯合運動成果的體現。合一運動加強了各教會之間的合作，有助於中國基督教會的自立和本色化進程。其三，本色化運動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從教義角度上符合中國人的

^① 參見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35頁。[DUAN Qi, *Forge Ahea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4), 135.]

^② 參見張永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基督教會合一運動述評》，《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7-133頁。[ZHANG Yongguang, "A Review of the Unity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Religious Studies*, no.4 (2010): 127-133.]

靈性要求、信仰要求，在基督教的教義、儀規、聖經解釋等方面尊重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① 試圖從根本上去掉基督教“洋教”的帽子，真正實現基督教中國化。

（三）本土文化語境的譯著事業促進文化交流與融合

徐寶謙認為譯著事業的發展的確成為推動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因素。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載體和媒介，尤其是譯著事業更是文字功能的重要體現。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其實也就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與交流的過程，而譯著事業則在異域文化的傳播中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②。基督教在中國的譯著事業需要藉助中國語言文化體系，沾染中國文化色彩，這種“求同”方式才能得到中國文化的認同。因此，譯著事業的發展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從唐朝景教到19世紀基督新教在中國宣道的歷史可以看出，基於本土文化色彩的譯著事業是基督教在中國得以立足的重要原因。無論是以佛教為語言文化載體的唐朝景教，還是以儒家語言文化為參照的明清之際天主教，都因以本土文化體系為載體的譯著事業而實現傳道，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19世紀初傳入中國的基督新教，同樣把文字佈道作為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重要途徑。從基督教經典翻譯，到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創作，大量譯著作品的出版發行，確實推動了基督教“進入”中國文化的進程。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批判，基督教內部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積極回

^① 劉明：《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的問題與思考——以黑龍江地區為例》，《黑龍江民族叢刊》，2015年第6期，第1-12頁。[LIU Ming, "Problems and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Taking Heilongjiang as an Example,"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no.6 (2015): 1-12.]

^② 江文漢：《廣學會是怎樣的一個機構》，載《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7頁。[JIANG Wenhan,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 is the Guangxue Institute," in *Wen shi zi liao xuan ji*, Vol. 4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4), 7.]

應，強調文字事工的社會現實傾向性，更加注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社會相適應的本土化問題，如《聖經》和合本的語言體系以及與中國文化的融入，在新文學運動中被視為優秀文學的典範。^①據此可知文字事業的使命是“將基督教神學從西方的裝飾中解放出來，進行中國式詮釋，使之能與中國的環境脈絡、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相切合相適應”^②。

三、調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路徑選擇

徐寶謙在肯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具有調和之可能的基礎上，提出了調和二者的可行性方案。比較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徐寶謙認為“佛教之漸成中國的宗教”^③之經驗，可以供基督教參考，並從挖掘基督徒創新精神、推進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以及提高基督徒自身修養和人格魅力方面，給出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契合的奮進方向。

（一）“新的發現功夫”——培養基督徒的革新精神

徐寶謙認為基督徒的革新精神是助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他強調：“東方的信徒，除了研究西洋已有的成績外，應該作新的發現功夫。”^④這種“新的發現功夫”也就是所謂革新或創新。所謂革新，就是除舊佈新，去除落後的、不適應現實需要的舊有成分，探索先進的、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新因素。

徐寶謙根據發源於兩希文化而成為西方文化重要精神根基的基

^① 何凱立：《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陳建明、王再興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1頁。[HE Kaili,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trans. CHEN Jianming, et al.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1.]

^②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39頁。[ZHAO Xiaoyang, *The YMCA in China: A Quest to Indigenize and Moderniz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0), 239.]

^③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2頁。

^④ 同上，第48頁。

督教在西方的傳播，以及起源於印度而成為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經驗指出，二者的成功歸因於教徒“遠到的發現”和“革新精神”。^①任何宗教思想和信仰正統地位的確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都不可避免地經歷不同程度的挑戰，這就需要信徒與時俱進的精神，在改革中尋找出路。基督教從誕生就開始了不斷適應和改造的歷程，從最初基督教神學基本觀念的混亂、衝突，到阿塔納修《論道成肉身》中關於“基督神人二性”說，再到卡帕多西亞對“三位一體”基本教義的確立；從服務於教會權威和封建宗教神學精神壟斷的“因行稱義”，到馬丁·路德“因信稱義”對自由、平等等思想觀念的提倡，再到卡爾·拉納“匿名基督徒”思想的提出。這些例證充分佐證了基督教在成為西方主流文化和維護其權威正統地位的過程中，通過逐步改造而實現會通與融合。據此可知，徐寶謙提出基督徒革新精神培養的重要性，有助於打破西方文化思想體系的束縛，摒棄基督教排他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擔負“建設大乘基督教”^②的責任。對於中國基督徒來說，要勇於開拓創新，在新的試驗和探索中實現基督教在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生根開花，生成與中國社會、文化、民族相適應的中國基督教。

（二）“文學是宣傳的利器”——重視文字事工

徐寶謙認為“文學是宣傳的利器”^③，文字事工直接關係到基督教在華傳播範圍以及基督教“進入”中國文化核心的程度。文字是人類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是文化的基礎要素和鮮明標誌。^④提升文字工作水平，推進基督教文字事業的發展，不僅有利於西方文化

^①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8頁。

^②同上。

^③同上，第46頁。

^④參見黃勇：《語言文字事業應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語言文字應用》，2013年第1期，第11-13頁。[HUANG Yong. "Language and Writing Busines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Applied Linguistics*, no.1 (2013): 11-13.]

的中國化詮釋，而且有助於中國文化和思想體系的傳播，能夠更好地實現中西文化的雙向互動。因此，徐寶謙把文字事業看作是調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雖然基督教向來把文字事工視為基督教在華傳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存在嚴重問題，正如徐寶謙所指出的：為甚麼基督教沒能像佛教那樣與中國文化打成一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基督教的文字事業，可說是太幼稚太簡陋了”^①。徐寶謙所謂“幼稚”“簡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內容淺薄，形式單一。在內容方面，對西方教會、神學、靈修生活等方面著作的直接翻譯，主要是對西方傳教士思想觀念的轉述，缺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結合；另外，注意力集中於神學，而缺乏對相關領域思想和理論等深層次的關注，思想內容顯淺薄。在形式方面，翻譯作品佔絕大多數，創作能力缺乏。這種譯多撰少的局面，使基督教神學思想表達很難脫離西方文化語境。因此，漢語語境的缺失，增加了基督教神學思想融入中國文化的艱巨性，弱化了其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價值。那麼如何將上帝的福音從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語言載體轉譯成異質異教文化的語言載體，^②這就需要基督教文字事業的本土化，助推基督教在中國實現從“文化披戴”到“文化融入”的轉化。一方面，不僅要拓寬文字事業的視野，提高其思想理論層次；而且要注重與中國文化的結合，實現從基督教文化體系到中國文化語言體系的轉化。另一方面，必須提升中國基督徒的創作能力，從社會實際出發，反映現實需要，實現中國信徒在宗教信仰上的思考權和話語表達權。^③只有自覺適應中國社會對異質文化的要求，才能發揮其在文化認同中的作用。

（三）“靠着個人人格的感力”——提升人格修養

徐寶謙指出增強基督徒的人格感力，改善基督教傳佈方式是實現

^①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6頁。

^②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第217頁。

^③ 同上，第238頁。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又一有效途徑。徐寶謙認為基督教依靠政治和軍事力量進駐中國，是導致其在華得不到認同的重要原因。“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①因此，徐寶謙提出要通過基督徒高深的人格而不是強制手段“使有數千年人本思想背景的中國人信服”^②。

徐寶謙認為根據《約翰福音》的著者所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1:18），耶穌基督通過“道成肉身”實現“救恩”，而“救恩”的方式是耶穌的十字架。因此，“十字架充分表現上帝對世人所顯犧牲的愛”^③，而所謂基督徒，就是“背起十字架，跟從耶穌基督的人”^④。據此，基督徒應該擔負傳揚“道成肉身”蘊含的“愛”之真精神的責任，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從而促進基督教在華宣傳的新突破。那麼，基督徒該如何踐行“十字架精神”也即“愛”的精神。徐寶謙根據使徒保羅對耶穌基督愛的詮釋，“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處……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13: 4-8），認為基督徒應該通過犧牲、包容、無私、恩慈等來實踐“愛”。十字架“愛”之精神是每一位基督徒應該具有的品格，並且要積極主動地將這種人格修養外化於具體的實踐活動，增強其感召力和影響力。基督徒作為傳道主體，其人格修養的提升，有助於基督教實現從傳播到理解再到認同的轉變，從而助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貫。

四、結語

本土化是基督教在異質文化中存續，並發展成為世界宗教的關

^① 楊伯峻譯註：《孟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74頁。[YANG Bojun, trans., *Mencius*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88), 74.]

^②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4頁。

^③ 同上，第50頁。

^④ 同上。

鍵。從世界宗教史來看，千百年來幾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能夠廣為傳播，其首要條件無疑在於，它們均能適應不同的文化、民族、國家或社會境遇，並以不同的方式來實現本色化、本土化、處境化或民族化。^① 為甚麼要本土化或者說異質文化之間的調和？因為文化之間存在差異性。為甚麼異質文化之間的張力具有可控性？因為異質文化之間具有相通性，文化不僅是民族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所以，徐寶謙堅持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會通之可能和必要。

徐寶謙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貫。他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之點進行了比較客觀的對比分析，這種對比只是為了找到二者的不同之處，以更好實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調和，而並非是對基督教或中國文化的否定。所以這種觀點是比較溫和的。

雖然徐寶謙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態度比較理性，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徐寶謙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分析，重要集中於基督教與儒家文化的比較，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其他組成部分如道、墨、佛等學派的分析。徐寶謙認為基督教重內修，儒家文化重外治，其實儒道佛等學派同樣十分注重內在修養，儒家有“殺身成仁”（《論語·衛靈公》），“捨生取義”（《孟子·告子上》），“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張》）；道家有“夫形動而心靜，神凝而跡移者，無為也。閑居而神擾，恭默而心馳者，有為也。無為則理，有為則亂”（《宗玄先生玄綱論》），“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淮南子·主術訓》）；佛教有“以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外境本空。”（《宗鏡錄》卷33）“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楞嚴經》卷5）等等，所以，以內修與外治概括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區別有失客觀。另一方面對於調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路

^① 卓新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4頁。[ZHUO Xinping,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al Publisher, 2013), 3-4.]

徑選擇，徐寶謙多集中於基督徒個人層面，而缺少教會組織層面的探索。儘管基督徒個人的能力和修養在促進二者融合過程中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同樣不能忽視教會組織的影響，教會的內部改良可以產生推動效應，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雖然徐寶謙從理論上論證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具有調和之可能，但是實際工作仍然極具艱巨性。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文化對話地位的不平等。一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利用政治和軍事力量作後盾，擴大宣傳，使基督教帶有的侵略性始終沒能從中國國民心中摘除。二是基督教的排他性，基督教作為一神教，排斥其他一切信仰，這與中國多教並存的歷史和現實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三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阻礙，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最優秀的文明，是一切其他文明的標準。這種“西方中心論”的優等心理，增加了文化交流對話的對抗性。

反觀現實，在和平與民主的時代主題背景下，世界格局朝着多極化趨勢發展，西方中心論也在逐步消解，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廣泛的國際共識。這也對文化之間的交流提出更高的要求，保持良好的雙向互動，從而實現以交流促融合，以融合促發展，凸顯了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的必要性。所以，對徐寶謙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研究，其中關於二者並行不悖而非衝突之基本立場，以及二者調和之可行性路徑的論述，之於二者的融合發展具有一定的鏡鑒意義。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YEUNG, Kwok-keung. "Taking Up Wordly Causes with a World-Rejecting Spirit: The Religio-Political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Xu Baoqian(1892-1944)." PhD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DUAN Qi. *Forge Ahea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4.]

何凱立：《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陳建明、王再興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HE Kaili.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Translated by CHEN Jianming, et al.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黃勇：《語言文字事業應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語言文字應用》，2013年第1期，第11-13頁。[HUANG Yong. "Language and Writing Busines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Applied Linguistics*, no.1 (2013): 11-13.]

江文漢：《廣學會是怎樣的一個機構》，載《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1-42頁。[JIANG Wenhan.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 is the Guangxue Institute." *Wen shi zi liao xuan ji* (Selected historical literature), Vol. 43, 1-4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4.]

藍希峰：《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服務研究：以江西基督教農村服務聯合會黎川實驗區為個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LAN Xifeng. *A Case Study of Christian Social Servi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x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 Lichwan Service Centre*.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15.]

雷立柏：《論基督之大與小：1900 ~ 1950年華人知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Leeb, Leopold. *Christianity in the Ey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1900 to 1950*.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0.]

劉家峰：《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義的命運——以徐寶謙與賀川豐彥為個案的比較研究》，《浙江學刊》，2007年第2期，第97-105頁。[LIU Jiafeng. "A Case Study of the Fate of Modern Sino-Japanese Christian Pacifism: Xu Baoqian and

- Kagawa Toyohiko."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6 (2007): 97-105.]
- 劉明：《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的問題與思考——以黑龍江地區為例》，《黑龍江民族叢刊》，2015年第6期，第1-12頁。[LIU Ming. "Problems and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Taking Heilongjiang as an Example."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no.6(2015): 1-12.]
- 沈恆炎、燕宏遠：《國外學者論人和人道主義》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SHEN Hengyan & YAN Hongyuan. *Foreign Scholars on Humanity and Humanitarianism*, Vol.1.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1991.]
-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1年。[WU Lim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Hong Kong: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席雲舒：《從物本主義、神本主義到人本主義——“中國精神現象學”的視角與當代社會轉型》，《文藝爭鳴》，2000年第3期，第51-56頁。[XI Yunshu. "From Materialism, Deityism to Humanis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ntal 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Transformati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no.2 (2000): 51-56.]
- 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1860-1911）》，香港：宣道出版社，1995年。[YING Fuk-tsang. *Cultural Acculturation and Chinese Christians(1860-1911)*. Hong Kong: China Alliance Press, 1995.]
- 徐寶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年版。[XU Baoqia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34.]
- 許頌聲：《到民間去！——徐寶謙與黎川基督教農村服務運動》，《台灣浸信會神學院學術年刊》，2005年，第73-90頁。[XU Songsheng, "XU Baoqian and LI Chwan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Movement." *Academic Yearbook of Taiwa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5): 73-90.]
- 楊伯峻譯註：《孟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YANG Bojun, trans. *Mencius*.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88.]
-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YANG Tianhong. *Christianity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姚西伊：《中國基督教唯愛主義運動》，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年。[YAO Xiyi. *Chinese Christianity Patriotic Movement*. Hong Kong: Logos Publishers Ltd., 2005.]
-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3年。[ZHA Shijie. *Biography of Chinese Christian Characters*. Taipei: China Gospel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3.]

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ZHANG Dainian. *A Survey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張艷嬰譯註：《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ZHANG Yanying, trans. *The Analects*.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7.]

張永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基督教會合一運動述評》，《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7-133頁。[ZHANG Yongguang. "A Review of the Unity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Religious Studies*, no.4(2010): 127-133.]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ZHAO Xiaoyang. *The YMCA in China: A Quest to Indigenize and Moderniz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0.]

周振甫譯註：《詩經》，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ZHOU Zhenfu. *The Book of Poetry*.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2.]

卓新平：《世界宗教與宗教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ZHUO Xinping. *World Religions and Religious Studi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1992.]

卓新平：《基督宗教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ZHUO Xinping.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0.]

卓新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處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ZHUO Xinping.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al Publisher, 2013.]